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5期(民國108年9月),49-8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另一場新文化運動
——梁啟超諸人的文化努力與五四思想界*

周月峰**

摘要

既往關於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多忽視其多元互歧、眾聲喧嘩的一面。實際上,新文化運動本為多個群體、多種方案並存,在相互聲援、修正與競爭的互動過程中形成。其中,梁啓超諸人的努力及方案尤其重要,影響深遠。該群體有自己的「新文化運動」理念,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創造一種既不同於中國、也不同於西方的新文化,實現再造文明。其目標和方式都與北大師生輩有所不同,與《新青年》同人之關係在追隨與反對之間,常思調節新文化運動之走向。該群體並非新文化運動的外在對立物,也不僅只是另外一種聲音,而是參與了時代的思考,形塑了時代的思潮,在新文化運動風氣轉變過程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後來歷史記憶所抹去的,不單是他們的文化觀點與作為,更抹去了他們所發揮的實質作用。

關鍵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梁啟超、研究系、張東蓀

* 本文係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啓超諸人再造新文明的努力」(17FZS02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報告(2017 年 6 月 8 日),黃自進教授、余敏玲教授、陳建守教授等師友的評議,對後續修改很有幫助;此外,在寫作過程中,承清華大學歷史系李欣然兄、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劍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季劍青兄糾謬,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18 年 12 月 1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 年 7 月 5 日。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引　言

錢鍾書常用「一束矛盾」來形容自己。[1]事實上，新文化運動[2]正是非常典型的「一束矛盾」。林同濟看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內容本甚豐滿，甚複雜」，「以至矛盾」，「實百花爭發的初春，盡眩目薰心之熱致」。[3]如此情狀，正似余英時所說，「五四始終是、也仍舊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點，當時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4]

有意思的是，在時過境遷之後，人類對複雜的時代常常會有「集體健忘」，把「千頭萬緒簡化爲二三大事，留存在記憶裡」。[5]我們所熟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便是一件被簡化了的大事。溝口雄三注意到很長時期學術界存在左、右兩種「五四」敘述：第一種「只是抽出了傾向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有關的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道路」，是「被作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相連接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第二種是「胡適等後來走上與中共對立道路的人士的軌跡」。他繼而認爲，在二者之外，梁漱溟（1893-1988）就體現了「另一個『五四』」。[6]

1 楊絳，〈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收入錢鍾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2。

2 本文使用「新文化運動」時，如無特別說明或加雙引號，則是在一般的、廣義的、寬泛的意義指代五四前後的革新運動；在特指「梁啓超諸人」和其他特定群體的新文化運動時，則加引號以爲區別。

3 林同濟，〈廿年來中國思想的轉變〉（1941 年 5 月 4 日），收入江沛、劉忠良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雷海宗．林同濟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 577。

4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入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 25-26。

5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頁 3-4。

6 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收入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618。

溝口雄三所說的「五四」實爲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且「五四」還不只有「另一個」，[7]情狀或許更爲豐富。在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胡適（1891-1962）或梁漱溟之外，本文「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是指梁啓超（1873-1929）、張東蓀（1886-1973）、藍公武（1887-1957）、張君勱（1887-1969）、蔣百里（1882-1938）等人（以梁啓超爲核心的一個讀書人群體，以下簡稱「梁啓超諸人」[8]）的新文化主張與實踐，即這是在左右之外、幾乎被遺忘的以梁啓超諸人爲主角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

這一群體有其自身的「新文化運動」，在當年具有重要影響，其目標和方式都與北大師生輩有所不同（不僅限於我們熟知的「民主」與「科學」）。他們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創造一種既不同於中國文化也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實現「再造文明」。但該群體又並非既存言說中新文化運動的外在對立物，也不僅是在一種聲音之外加入了另外一種聲音，而是參與了時代的思考，形塑了時代的思潮，在新文化運動風氣轉變過程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關於梁啓超（或「研究系」）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係，尤其是揭示「研究系」在幕後發動學生運動，是近年研究的熱點，新論迭出。[9]相較於此，對梁啓超一派與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關係的討論仍有不足。與早期學界多以《新青年》的聲音概括、代替全部新文化運動不同，周策縱、胡繩較早注意到梁啓

7 其實時人已注意及此，故也有「又一種文化運動」的提法。一眞，〈哲學研究社之大擴展〉，《京報》，1921 年 2 月 25 日，第 3 版。

8 這一群體的主要成員因多與憲法研究會有關係，且梁啓超更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所以時人和後世研究者也有以「研究系」指稱的，如彭明的〈「五四」前後的研究系〉，《歷史教學》，1964 年第 1 期，頁 25-32。然而，就五四前後梁啓超一系的文化活動而言，一般被認爲屬於「研究系」的人未必參與這些事業，而參與者也多否認是「研究系」中人或有「研究系」這一團體。所以，由於「研究系」這一稱謂容易與憲法研究會成員混淆，以及其在歷史上所具有的貶抑色彩，爲避免誤解，本文仍以「梁啓超諸人」來指代在五四前後梁啓超周圍所形成的群體。

9 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鬥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 年第 4 期，頁 28-41；李達嘉，〈五四運動的發動：研究系和北京名流的角色〉，收入李達嘉編，《近代史釋論：多元思考與探索》（臺北：東華書局，2017），頁 119-180；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2018 年第 5 期，頁 61-81。

超等人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然均點到即止。[10]張朋園側重於梁啓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活動，而未涉及其新文化方案。[11]此外，由於梁啓超諸人在五四前後的言行與《新青年》同人的「新文化運動」有許多相似處，故自 1990 年代開始，有學者認爲梁啓超「緊跟時代潮流」，其言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內容完全合拍」，「研究系與新文化運動有相當關係」，「是新文化運動的辯護者而非敵對者」。他們雖注意到了《新青年》之外的群體，卻仍受整體論影響，心中多有「新文化運動」的特定圖像，以此爲標準，規範、選擇甚至裁剪其他方案與行動，削足以適履，反而忽視了梁啓超諸人自身新文化方案、實踐的獨特性，也未能進一步呈現他們展開「新文化運動」的故事。更重要的，以往研究均未在互動中充分展現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具體影響。[12]

歷史上的人與事通常是一個更寬廣的歷史整體之片斷。誠然，吾人考察的往往只是事後截取的歷史片斷，然而，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忽視其爲周流變動的關聯性結構之一部分，或在關聯性結構中的具體位置，則即使考察之後，具體的人與事變得清晰（實際也未必），但有時對歷史整體的瞭解不僅未能推進，反有可能更加模糊。研究新文化運動亦然，若僅關注一人一派，即使重要

10　周策縱較早注意到梁啓超一系的《國民公報》、《晨報》、《時事新報》在五四時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繩晚年特別強調「中間力量」的存在，也承認「梁啓超、張東蓀反對當時搞社會主義革命，主張先發展資本主義，也不能說是反動的，因爲資本主義在當時是進步事物」。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 96；「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8。

11　張朋園，〈梁啓超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卷 6 期 1（1973 年 3 月），頁 1-15；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 128-152。

12　崔志海，〈梁啓超與五四運動〉，《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90-206；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爲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鄭師渠：〈梁啓超與新文化運動〉，《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1-37；元青，〈梁啓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頁 44-51；董德福，〈梁啓超與五四運動關係探源〉，《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8 期 6（2006 年 11 月），頁 29-36。李茂民近年的研究已注意到梁啓超新文化建設方案的獨特性，「既不同於激進主義方案，也不同於保守主義方案」，「而是一種更爲穩健和富有建設性與可行性的方案」。但作者將梁啓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抽離於歷史語境做靜態考察，未必眞是「回到五四」，故也未眞能瞭解梁啓超之所欲言。參見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啓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7、34-35。

如《新青年》同人，仍將「不免於隘」。[13]相較而言，對於理解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而言，相互關係可能更爲關鍵，尤其要注意「整個結構中各局部間的相生相成的綜合功用」。[14]梁啓超諸人與運動中「各局部間的相生相成」正是重要卻未被足夠重視的論題。故本文在簡要論述梁啓超諸人有「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之後，將側重討論他們在新思想界的自我定位、與其他新文化群體之關係，以及在互動中所發揮的實際影響。期望通過對梁啓超諸人「新文化運動」的梳理，豐富對廣義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認識——即「另一場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層含義：它不僅僅是某個特定群體的運動，而是多群體、多方案混流並進的過程，呈競合相，這些形形色色相互競流的群體，構成了層次豐富、色調極其含混複雜而又像漩渦般交互雜糅的動態圖景——能包含各種新文化方案、相生相成的，更接近歷史原貌的廣義新文化運動。

二、梁啟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

近代中國古今、中西交匯，社會變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態發展又不同步，致使存在多個世界及眾多群體，其中「不新不舊」的人與事，以及新舊陣營中表現不那麼極端或積極的群體，在既有研究中多半處於一種「失語」的狀態。[15]五四時期的梁啓超諸人正是不那麼極端的群體，雖非完全失語，但相對於他們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而言，研究顯然仍非常不足。與這一群體的失語相關聯的，是他們所從事的文化運動一併被誤解或遺忘。

13 蒙文通說：「事不孤起，必有其鄰。」又說因唐代新經學、新史學、新哲學、新文學「一貫而不可分」，故「由新文學之流派以見一般新學術之流派則可，惟論新文派以及其思想，而外一般新學術，將不免於隘」。蒙文通，〈評《學史散篇》〉，收入蒙默編，《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書社，2015），卷 2，頁 472。

14 林同濟曾將「相互關係」視爲「觀察萬物的『入道之門』」，認爲研究歷史的要旨便是「談『關係』，談互動的，相對的關係」，「談整個結構中各局部間的相生相成的綜合功用」。林同濟，〈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新階段的展望〉（1940），《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雷海宗．林同濟卷》，頁 572、576。

15 參見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 259-263。

這是一群徘徊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讀書人，有著國士的關懷與抱負。該群體以梁啓超爲領袖，成員多爲梁氏清末民初（特別是護國運動期間）事業上的同志和新舊門生，或因理念相近、或基於師生之誼、或有共事經歷，在 1918 年前後逐漸匯聚，形成一鬆散的文化、政治團體，沒有嚴格的組織，邊界模糊。

他們所舉辦的文化事業主要包括：其一，辦報，包括《時事新報》、《晨報》、《國民公報》，尤其是它們的三種副刊──一般認爲新文化運動四大副刊中，《學燈》與《晨報副刊》便佔半壁江山。其中，胡適將《國民公報》比作新文化運動中「一顆大星」，而《晨報》被認爲「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確有很大的功績」，《學燈》更是「爲一般新學界所歡迎」，甚至「有左右學術界的勢力」。[16]其二，創辦了在五四時影響極大的《解放與改造》雜誌。1919 年前後在中國講學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觀察到，當時有三份「發揮著重大影響」的刊物成爲了「新文化運動喉舌」，除了《新青年》、《新潮》之外，便是梁啓超一派的《解放與改造》。[17]其三，成立共學社，出版「共學社叢書」，在當時被稱爲「研究系文化運動之一別動隊」。[18]其四，成立講學社，邀請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等人講學。這一機構影響亦大，在當時曾形成一種講學之風，轉變學風，激起新潮。青年學生王凡西對新文化運動的印象是「從杜威、羅素、柏格森到泰戈爾」等等的大名，[19]而這些人恰恰又多是講學社介紹或邀請到國內的。其五，接辦中國公學，創辦自治學院，梁啓超等人陸續講學清華、南開、東南大學等，在教育界成爲一股重要力量。

16　胡適，〈一顆遭劫的星〉（1919 年 12 月 17 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10，頁 113；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上海：現代書局，1932），下編，頁 32；上編，頁 63。

17　杜威，〈中國的新文化〉（1921），杜威著，趙協眞譯，《杜威全集．中期著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卷 13（1921-1922），頁 104。

18　茅盾，〈周、楊姻緣之一幕〉，《茅盾全集．散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卷 12，頁 98。

1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頁 7。

大致而言，就他們發動的事業觀之，此群體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爲梁啓超、張東蓀、藍公武、張君勱、蔣百里等數人而已。其他如徐新六（1890-1938）、林長民（1876-1925）、黃溯初（1883-1945）、丁文江（1887-1936）、舒新城（1892-1960）、徐志摩（1897-1931）、宗白華（1897-1986）、俞頌華（1893-1947）、茅盾（1896-1981）、鄭振鐸（1898-1958）等都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參與過他們的事業。成員多數在梁啓超影響最大的時期成長，深受任公文字的「洗禮」。[20]

此群體的核心成員自清末開始便爲政治改革奔走呼告，鼎革之後，也多參與實際政治。民初數年本是「一個政治熱絕頂的時代」。[21]楊杏佛曾稱之爲「有政無學時期」，「昔日在野鼓吹改革之學者，皆身親政治」，[22]兩度出任總長的梁啓超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張君勱、蔣百里、藍公武等也常隨任公身居要職，或參選議員。[23]但在 1914、1915 年之後，政局即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分崩如故」。[24]張東蓀於護國之役後入京，經過數月觀察，認定此後政局將是「不死不生之形態」，[25]除「無辦法」三字外，「不足以狀現時之中國」，且「無辦法」已是「一時流行之辭」。[26]

隨著政局每況愈下，梁啓超一派的政治境遇也近乎山窮水盡。1917 年底，國務總理段祺瑞辭職，內閣中「研究系」人物梁啓超、汪大燮、湯化龍、林長民、范源廉、張國淦等均辭職。曾經希望憑藉該黨菁英入閣「樹政黨政治模範」、

---

20 如舒新城便說自己少年時期一度對「一部舊《湘學報》」「愛不忍釋」，尤其是其中梁啓超所訂的「時務學堂的十條學約」，他「更照著學約所指示的去律己，於我後來治學治事的效益很大」。舒新城，《我和教育》（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上冊，頁 65。

21 常乃悳，《中國文化小史》（上海：中華書局，1928），頁 172。

22 楊銓（杏佛），〈民國十三年之學術觀〉，《申報》，1924 年 10 月 10 日，「國慶紀念增刊」，第 10 版。

23 護國之役後，張君勱先後任國際政務評議會書記長、總統府秘書，蔣百里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藍公武任議員。

24 語出常乃悳，《中國文化小史》，頁 173；楊銓（杏佛），〈民國十三年之學術觀〉，《申報》，1924 年 10 月 10 日，「國慶紀念增刊」，第 10 版。

25 （張）東蓀，〈歸來雜話〉（二續），《時事新報》，1917 年 4 月 5 日，第 2 張第 3 版。

26 （張）東蓀，〈勿墮落〉，《時事新報》，1917 年 4 月 10 日，第 1 張第 2 版。

「引他黨於軌道」，「實現吾輩政策」[27]的嘗試再一次挫敗。結果則是該派「業經風流雲散，毫無作用」，[28]就黨勢言，已「毫無組織，黨已不黨」、「若存若亡」。[29]

追隨梁啓超一起去職的人中，有張君勱、徐新六，蔣百里也於蔡鍔去世後賦閑京師。他們隨梁啓超在政治上的失意而失意，加上之前受命主持《時事新報》和《國民公報》的張東蓀、藍公武，形成了這一群體的核心。

政治失意，使他們「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30]遂決定從政治努力轉向文化努力，想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31]其實，類似的計畫從未間斷，如 1917 年初梁啓超便曾「擬下三年苦功」周歷講演，希望「從後台下手改良」，造「十年後作種種活動之人物」；[32]1918 年上半年又曾計畫發起松社「爲講學之業」，「提倡風氣」，以及創辦「專言學問，不涉政論」的雜誌。[33]但最後均未果行。藍公武後來曾總結，對文化事業，雖同人也都「常想做這事業」，「可都是誤於政治活動，從未切實做去」。[34]實際上，這種從政治到文化的轉變或許並沒有梁啓超自己所說的那麼界線分明，他們更多時候是在兩者之間猶豫與徘徊（或想兩者兼顧）。

---

27 〈北京電〉，《申報》，1917 年 7 月 30 日，第 1 張第 2 版。

28 劉以芬，〈研究系之來龍去脈〉，《民國政史拾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13。

29 本炎，〈評國民黨及研究系〉，《孤軍》，卷 2 期 5、6（1924 年 10 月 10 日），頁 15；一卒，〈中國政黨小史〉，《孤軍》，卷 2 期 5、6（1924 年 10 月 10 日），頁 61。

30 梁啓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45。

31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1918-1919），《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頁 39。

32 〈梁任公今後之社會事業〉，《大公報》（長沙），1917 年 2 月 8 日，第 6 版。

33 張君勱，〈致任公先生書〉（1918 年 1 月 12 日），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859；梁啓超，〈致陳叔通君書〉（1918），《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863。

34 藍公武，〈革新家之態度問題——藍公武答胡適之書〉（續），《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3 月 1 日，第 3 張第 3 版。藍公武此信極長，從 1919 年 2 月 11 日起開始在《時事新報》連載（《國民公報》從 1919 年 2 月 7 日起連載，至 26 日止），後刪節後刊登於《新青年》，卷 6 號 4（1919 年 4 月）。

他們這一次想從思想界盡力的具體計畫大約在梁啓超等人赴歐前形成。據梁啓超後來追述，在 1918 年底去國之前，「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並說這一席話讓他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35]這一決定並非草率形成，稍早之前張君勱、張東蓀、藍公武就曾「論中國前途，常以爲必經思想革命一階級」。[36]稍後熊正理從美國覆信張東蓀，印證了梁啓超所言，信中說：

> 左右與君勱、志先諸公商定任公於十年以內絕對不近政權，專從文化方面，另造一種新勢力，改黨造黨。[37]

當時梁啓超一派是否眞打算決然捨棄政治活動，尚待考證，但「在思想界盡些微力」已是他們一個付諸行動的重要選項。他們的三份機關報在此前後紛紛改革，如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誓言「對於文化思想的鼓吹，當唯力是視」，《國民公報》也將此後論述旨趣設定爲「對於政教藝術，誓有以革今日之陋俗，而使吾國思想界，闢一新境界焉」。[38]待梁啓超一行歸國，又重申「對於現實的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爲最）皆一概絕緣」，[39]在上海見到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也仍「慨歎他二十餘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對政治已無興趣」，並「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贊助」。[40]除了「十年」變「五十年」之外，前後思慮十分接近。這一決定成爲他們此後數年事業之指導。

1918 年底的決定或能視爲梁啓超諸人此次從事文化運動之開始，也賦予他們新的定位。五四學生運動之後，張東蓀是「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兩個名詞最早的使用者之一，他認爲那時的各項事業中，「以文化運動爲最

---

35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1918-1919），《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頁 39。
36 （張）君勱：〈論國家前途書〉，《時事新報》，1918 年 7 月 17 日，第 1 張第 2 版。
37 熊正理，〈熊正理致張東蓀書〉（1919 年 3 月 2 日），《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4 月 12 日，第 3 張第 4 版。熊正理爲熊純如之子，時留學美國，後曾任東南大學教授等職。
38 （張）東蓀，〈精神生活與輿論政治〉（下），《時事新報》，1918 年 12 月 19 日，第 1 張第 2 版；毋忘：〈本報重刊之旨趣〉，《國民公報》，1918 年 10 月 21 日，第 2 版。
39 〈梁任公抵滬後之譚〔談〕話〉，《申報》，1920 年 3 月 7 日，第 10 版。
40 張國燾，〈第一次會晤孫中山先生〉，《我的回憶》（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卷 1，頁 70。

要」。[41]他將這篇題爲〈第三種文明〉的文章作爲機關刊物《解放與改造》創刊號的社論，具有開場鑼鼓之意味。幾個月後，《時事新報》同人因認爲文化運動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初步的方法」，故趁新年之機再次宣言，「願意把這張小小的報紙公開做全國文化運動的機關」。[42]

此種自我定位爲國內同人與旅歐諸人所分享，當時隨梁啓超赴歐的張君勱曾給國內同人一信，商討歸國後的團體事業，其中包括中比貿易公司、中比輪船公司、月報及印刷所、大學、派留德學生諸事，並說印刷所是「擬爲文化運動計，創刊小叢書」所必需。[43]正如他們在歐洲所計畫的，梁啓超諸人歸國後創辦共學社，開宗明義即說：

> 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既為吾輩今後所公共祈向，現在即當實行著手，頃同人所立共學社即為此種事業之基礎。[44]

將「宣傳新文化」視爲「吾輩」、「同人」的公共祈向。因此即使是梁啓超在當時偶有發表政論，仍會引起同人質疑，使他不得不自辯絕無政治活動。[45]這無疑最能說明他們的「新文化運動」是有計畫的、有群體意識的行爲。隨著他們文化事業的展開，這一團體的成員既有新加入者，也有離開者，各時期稍有不同。

在推行事業過程中，他們常常用心尋找、培養同道。茅盾在投稿《學燈》數次之後，張東蓀便在報紙上約其「常常來館，以便接談，藉請教益」。後來茅盾回憶時也說由於常在《學燈》投稿，「張東蓀辦《解放與改造》時就約我寫文章」，「認爲發現了一個人材，就有意要拉我到《時事新報》工作」。雙方

41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1919 年 9 月），頁 4。關於「新文化運動」一詞的產生與流行情況，可參見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28-47。

42 〈我們的宣言〉，《時事新報》，1920 年 1 月 1 日，第 2 張第 1 版。

43 張君勱，〈與溯初吾兄書〉（1920 年 1 月 12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896-897。

44 梁啓超，〈致伯強亮儕等諸兄書〉（1920 年 5 月 12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09。

45 梁啓超對同人自辯說：「偶作兩文，亦非對於現狀見獵小〔心〕喜，實欲借此刺激，爲政治教育一種手段耳。」梁啓超，〈與東蓀書〉（1920），《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23。

一度十分親近，張東蓀離滬外出時甚至請其代理《時事新報》主筆。[46]又如，蔣百里在讀到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後，認為其「結末之告白，大與吾輩自由講座之宗旨相合」，故致信梁啓超建議拉攏，梁啓超欣然同意，表示「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所以才有梁漱溟記憶中梁啓超「偕同蔣百里、林宰平兩先生移尊枉步訪我於家」一事。[47]

對此，舒新城曾注意到，為了這一系列事業，「他們很想從所謂新進作家中延攬一批人，以為文化努力」；又說：「八年梁等致力於文化運動，很想吸收一批人才，造成一種新勢力。」舒新城自身便是被發掘的同道之一。為聘請其擔任中國公學中學部主任，蔣百里「曾過舍相訪，說明公學之種種情形，我之教育主張亦概被接收」。[48]舒氏加入中國公學後，同樣擔負了延攬人才的任務，他曾表達「頗感人才困難」，故主動請纓，計畫「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學生數月，或者當較有補益，蓋僅在紙上相見，終止知其一面，無由窺其人格之全豹也」。[49]

可以說，除核心成員外，這是一個以事業為聚合的群體。並且，他們對於新加入者甄選嚴格。在辦理教育時，蔣百里曾草擬一份名單以供延攬，張東蓀看後即表示：「單上諸人，仍當以有無決心為標準，再淘汰一次。以蓀所知，止舒新城一人確有決心，與吾輩共甘苦也。」[50]可見他們對於新加入者的慎重，即梁啓超所說必須為「氣味相投之人」。[51]

---

46 〈通訊（張東蓀致雁冰）〉，《時事新報》，1919 年 9 月 25 日，第 3 張第 4 版；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學與政治的交錯〉，《茅盾全集．回憶錄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卷 34，頁 148、273。

47 蔣百里，〈與任師書〉（1921 年 11 月 26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1；梁啓超，〈致東蓀百里新城三君書〉（1921），《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5；梁漱溟，〈紀念梁任公先生〉，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 221。

48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冊，頁 149、165-166。

49 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1921 年 11 月 23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39。

50 張東蓀，〈致蔣百里書〉（1920 年 10 月），《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25。此外，他們也曾注意到毛澤東的「湖南自修大學不易成立」，希望物色「彼中良份子分一二位來此」，直到舒新城指出「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而作罷。梁啓超，〈致百里東蓀新城三公書〉（1921），《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3；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1921 年 11 月 23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0。

51 梁啓超，〈致百里東蓀新城三公書〉（1921），《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4。

同時，亦有人離開梁啓超諸人群體。例如，在梁啓超歐遊期間，張東蓀曾以《學燈》、《解放與改造》為平臺，吸引了像茅盾、周佛海（1897- 1948）等眾多五四青年。但當梁啓超他們回來之後，重新樹立文化方針，其他意見相左且人際關係上淵源較淺者，如俞頌華、茅盾、周佛海等人，或疏遠或徹底離開。茅盾便記得在周佛海加入共產黨之後，特意在《民國日報》上發一啓事，「謂共學社叢書中有渠所譯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一書，但此為售與共學社者，除此售稿關係而外，渠與共學社別無關係」，蓋因理念已不同，故劃清界限。[52]

其實，梁啓超一派對於自己在從事新文化運動並無疑義。當有外人批評新文化運動時，張東蓀會自覺解釋、辯護，他說：「文化運動本為公開，並他人之加入而不拒絕，安有拒絕他人批評之理。」又說：「我儕雖學淺力薄，然以良心之督責，盡其所能，以從事於文化，亦深感不足。苟有異軍蹶起，分肩此鉅責，豈不甚善？」[53]從中依稀可見他自居文化運動主人的姿態，蓋如果自身是客，又如何能以主人的姿態歡迎批評與歡迎「分肩此鉅責」？且視他人為「異軍」，則隱然以「正軍」自命。近二十年後，《時事新報》在追述自身歷史時，稍退一步，但仍認為自己在五四時期「雖然不是思想界的主潮，可是做了新文化的鼓手」。[54]這是在時過境遷之後的論定，不過，在新文化運動進行階段，他們確實有著與《新青年》一較高下，「爭那個你偏我正」[55]的努力。

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分前後兩個階段：1918 年底梁啓超、張君勱、蔣百里遊歐，國內文化事業由張東蓀、藍公武主持，又以張東蓀為主導，這一狀況持續到 1920 年初；[56]之後梁啓超、蔣百里歸國，親自主導他們的「新

52 茅盾，〈周、楊姻緣之一幕〉，《茅盾全集．散文二集》，卷 12，頁 98。
53 （張）東蓀，〈文化運動之批評者〉，《時事新報》，1920 年 9 月 21 日，第 2 張第 1 版。
54 〈復刊辭〉，《時事新報》（重慶），1938 年 4 月 27 日，第 1 張第 2 版。
55 傅斯年，〈答《時事新報》記者〉，《新潮》，卷 1 號 3（1919 年 3 月），頁 529。本文引用的《新潮》為上海書店 1986 年影印版。
56 張東蓀當時被視為「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張國燾，〈第一次會晤孫中山先生〉，《我的回憶》，卷 1，頁 70。關於張東蓀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方案，可參見周月峰，〈五四運動與張東蓀「總解決」方案的形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58 期 1

文化運動」，對此前的事業與方針均有重大調整。故新文化方案也可分爲前後兩種：前期側重社會改造，「主張先改造一個新社會，由新社會的力量來刷新政治」；[57]後期側重文化與政治，一面努力「文化運動」，一面「以政治運動與之輔行」。[58]前期具有徹底的革命性，「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以爲改造地步」，[59]來「一個眞正的大革命」；[60]後期則只強調「思想解放」。[61]前期將改造事業分成「總解決」和之前「不是短期的」培養階段，[62]在「大改造」之前的預備中，「以文化運動爲最要」；[63]後期不再提「總解決」。前期以社會主義爲改造藍圖；後期強調「決非先有豫〔預〕定的型範」，[64]基本放棄原先的社會主義改造趨向。

在文化層面，前期主張從中西文化中解放，認爲「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65]後期雖也認同從中西文化解放，但又宣導傾向東方文化的「以復古爲解放」。[66]在後期，梁啓超爲未來中國（甚至世界）擬就了再造一個新文明的辦法：

>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67]

（2019 年 1 月），頁 118-127；周月峰，〈「革命」的文化運動：「五四」後張東蓀的新文化方案〉，《天津社會科學》，2019 年第 3 期，頁 139-149。

57 （張）東蓀，〈政治意識〉，《時事新報》，1919 年 1 月 20 日，第 1 張第 2 版。

58 梁啓超，〈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改造》，卷 3 號 1（1920 年 9 月），頁 9。

59 〈本刊啓事一〉，《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1919 年 9 月），無頁碼。

60 （張）東蓀，〈各自改造〉，《時事新報》，1919 年 9 月 26 日，第 1 張第 1 版。

61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頁 25。

62 （張）東蓀，〈勢力與決心〉，《時事新報》，1919 年 9 月 24 日，第 1 張第 1 版。

63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頁 4。

64 大泉，〈銅器時代──本志表裝圖案的解說批評〉，《改造》，卷 3 號 1（1920 年 9 月），頁 3。

65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頁 5。

66 梁啓超，〈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改造》，卷 3 號 3（1920 年 11 月），頁 6。

67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頁 37。

在這一設計中，中國文化已是主體，西方文化則處於輔助地位。前後方案自具系統，且與同一時期《新青年》、國民黨人等方案各不相同卻又相互交錯（詳後）。

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持續數年，在 1923 年之後，中國逐漸進入「政治上狂風暴雨的時代」，[68]尤其是「五卅」後，「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除去一二人參加政治爭鬥外，其餘也都漸漸的沒落」。[69]同樣，梁啓超諸人也多已感覺「不能不管政治」，並且這是「多人凝〔擬〕議」的結果，認定「早晚是不能袖手」。有意思的是，梁啓超此時已開始認爲「這幾年來拋空了許久，有點吃虧」。[70]將「不近政權」的文化努力視爲「拋空」，正可見他們此時態度的轉變。在此前後，張君勱、蔣百里受孫傳芳聘，林長民受郭松齡聘，此派人物越來越深地參與到實際政治之中，興趣與精力都有所轉移，文化事業逐漸式微。

他們之後雖認爲不近政權、政治的文化事業爲拋空，但並不稍減他們此前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常乃悳甚至將梁啓超與胡適並列爲「新文化運動的健將」。[71]然而，同爲新文化運動健將的胡適，卻又稱其爲「敵人」，[72]則提示出梁啓超諸人雖與《新青年》同人雖共處新文化運動之中，關係卻仍十分緊張。

三、「調節其橫流」：在潮流追隨與反對之間的文化追求

相較於《新青年》同人，梁啓超諸人是新文化運動的後來者，他們加入新文化運動時，《新青年》創刊已四年，距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議〉亦有近兩

68 陳伯達，〈論五四新文化運動〉（1937 年 4 月 29 日），《認識月刊》，創刊號（1937 年 6 月），頁 68。

69 天行（周予同），〈第四期之前夜〉，《一般》，卷 6 號 1（1928 年 9 月，實際出版於 1929 年 1 月），頁 9。

70 梁啓超，〈給孩子們書〉（1925 年 7 月 10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1048。

71 常乃悳，《中國文化小史》，頁 178。

72 〈胡適致陳獨秀（稿）〉（1920 年底或 1921 年初），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卷上，頁 87-88。

年，當時的《新青年》一派正意氣風發，成爲思想界之中心，「把握著思想界的權威」，「新說既出，一部分人從風而靡，遂成社會上一問題」。[73]藍公武也有類似觀察，他致函胡適：：

> 在這幾年中，就這《新青年》諸君猛力進行，沒有好久，居然有許多贊成的、反對的，令一般人把諸君所說的話，都成了一個問題研究。這真是諸君開拓思想界的大功。[74]

在此情況下，梁啓超諸人一入思想界，首先要面對的即是當時思想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恰恰多是由《新青年》「鼓吹」而成。所以，參與討論這些話題之時，對《新青年》同人贊成抑或反對，成爲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經過短暫交鋒之後，他們很快便決定站在新派一邊。[75]在面對思想界的新舊之爭時，張東蓀旗幟鮮明地認爲「應當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不當爲第三者作壁上觀」。[76]

並且，在當時的主要論題上，梁啓超一派確實常常有相似的主張，故張東蓀對胡適說：

> 若論起學問內容來，我們與貴同人並沒有甚麼不合。貴雜誌不佞也常看見，除了改文為白話的主張以外，也有曾經是不佞說過的，就是白話，不佞狠〔很〕是贊成，並且主張加文法的要素，仿歐文的構造，早在敝報上發表。這次藍君志先告我，說先生與我主張一致，可見彼此對於學術內容上的意見實在沒有甚麼不同。[77]

73　天行（周予同），〈第四期之前夜〉，《一般》，卷 6 號 1，頁 9；惕若，〈新思潮〉，《時事新報》，1919 年 4 月 8 日，第 2 張第 1 版。

74　藍公武，〈革新家之態度問題——藍公武答胡適之書〉（續），《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3 月 1 日，第 3 張第 3 版。

75　關於早期雙方的關係，可參見周月峰，〈從批評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學燈》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研究》，2015 年第 6 期，頁 197-204。

76　（張）東蓀，〈我輩對於新思想之態度〉，《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4 月 7 日，第 3 張第 3 版。

77　（張）東蓀，〈答胡適之書〉，《時事新報》，1919 年 3 月 15 日，第 1 張第 1 版。

張東蓀說雙方「沒有甚麼不同」，並非僅是當事人的自抬身價，陶菊隱也觀察到：「張東蓀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藍公武在北京辦《國民公報》，陳博生也在北京辦《晨鐘報》（《晨報》前身），都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同路人。」[78]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張氏或有「爭歷史上的位置」的心態，[79]故只說雙方沒有甚麼不合，而不提自己一方是後來者，實際有響應《新青年》的因素。在時人看來，梁啓超諸人的舉動無疑是受到北京大學新風氣所影響。高一涵在1918 年底時便對胡適說《國民公報》「近來極力贊成我們的主張」，[80]「極力贊成」正是一種響應，並且是「近來」才有的事。當時該報更在《新青年》、《新潮》上刊登廣告：「現在力圖順應世界潮流，將內容大加改良。採訪中外新聞，務極靈確。主張正大，以期促政治之改進，謀思想之革新。」[81]刊登廣告本身就顯示了主辦者清楚知道改良以後的報紙與《新青年》、《新潮》有更多類似處，面對同樣的讀者群。在這一時期，《國民公報》甚至每天或轉載《新青年》文章，或公開致信《新青年》同人。這也是胡適後來說的「《國民公報》響應新思潮最早」。[82]有國民黨人稍後也注意到這一派「竭力跟著新潮流走，富于革新趣味」。[83]所謂「新潮流」，實際便是《新青年》引領的潮流。

例如，白話文學運動一直被認爲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方面，而梁啓超一派的幾份日報正是最早的響應者，除北大自身的《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外，「北京藍公武主持的一個研究系的機關報——《國民公報》，首先起而響應」，隨後《時事新報》也起來積極擁護。[84]故傅斯年（1896-1950）說他們「居然用白話做文」。在胡適看來，藍公武當時連續「做了好幾篇白話文章，還有極力贊成我們的議論」，是北方對《新青年》「贊成者更多」的表

78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1。
79 傅斯年，〈答《時事新報》記者〉，《新潮》，卷 1 號 3，頁 529。
80 〈胡適之先生來信〉，《國民公報》，1919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81 〈國民公報廣告〉，《新青年》，卷 5 號 6（1918 年 12 月），無頁碼。
82 胡適，〈一顆遭劫的星〉（1919 年 12 月 17 日），《胡適全集》，卷 10，頁 113。
83 無射，〈眞覺悟嗎？〉，《民國日報》（上海），1919 年 8 月 13 日，第 1 張第 3 版。
84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 206。

現，更將《國民公報》視爲自己一派「又征服了一塊地盤了」。[85]立場偏於反對白話文的李肖聃也觀察到，當時胡適「力主以語體代文言，號新文化」，李肖聃等希望梁啓超歐遊歸後「有以正之」，沒想到「梁著《歐遊心影錄》，乃效胡體爲俚語」，於是大失望，認爲是「欲謏聞動眾」之手段。章士釗甚至宣言於眾曰：「梁任公獻媚小生，隨風而靡。」[86]

在其他話題上，梁啓超諸人也常居響應的位置。梁啓超的老友周善培曾說：「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故勸梁：「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87]

後來梁漱溟更明確地指出，梁啓超他們是「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他說：

> 民國八九年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88]

梁啓超諸人確有追隨《新青年》同人一面。藍公武自己便曾對胡適自陳：「此後自當追諸君之後，努力做一個革新思想的機關。」[89]後之研究者也常據此論證梁啓超一派與新文化運動「主題、內容完全合拍」。[90]然而，如果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僅僅是追隨《新青年》，胡適或不至視其爲敵。瞿秋白（1899-1935）在五四時期便已注意到，新文化運動初起時，是「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不過，「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

85 胡適致許怡蓀（1920 年 1 月 20 日），收入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91。
86 李肖聃，〈星廬筆記 · 梁啓超〉，《追憶梁啓超（增訂本）》，頁 38。
87 周善培，〈談梁任公〉，《追憶梁啓超（增訂本）》，頁 136。
88 梁漱溟，〈紀念梁任公先生〉，《追憶梁啓超（增訂本）》，頁 218。
89 知非（藍公武），〈答胡適之先生〉，《國民公報》，1919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90 元青，〈梁啓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頁 44-51。

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原本潛伏的矛盾點便「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潮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91]梁啓超諸人與《新青年》同人在面對舊的勢力時，都屬於新派陣營，但其實潛伏著矛盾，正因雙方同在新文化運動之中，本有競賽，而新文化方案又有重要不同，且前者時時欲調節後者，才使胡適一方如臨大敵。

梁啓超一派整體傾向於新派，但對五四思想界，尤其是《新青年》同人所主導的傾向，有自覺且持續地「調節其橫流」之努力。尙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前，張東蓀即表明：

> 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單調的，我們應當將他化為複調的；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淺薄的，我們應當將他化為精深的；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偏激的，我們應當將他化為正中健強的。所以我輩對於新思想的態度是內在的，不是外表的，就是以新思想為目的，而去加工製造；不是以舊思想為的鵠，而去攻擊破壞。[92]

當時思想界新舊之爭正急，此派同人中出現分歧，「有人主張旁觀，有人主張加入戰團，幫新派一臂之力」，而張東蓀認爲，「應當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在新舊兩派之間選擇新派，卻又不幫新派「亂打」舊派，反倒是要對「新派加工」，以此影響新思想的整體性質，使其成爲複調的、精深的、正中健強的。這恰是一種既跟著跑又調節，邊跟著跑邊調節的狀態。他同時也對胡適表示自己一方「對於貴同人卻不是反對，實是『勸告』」。[93]藍公武在表明追隨胡適諸君之後，也批評《新青年》以「輕佻刻薄的話來攻擊個人」，「令人看了生厭」。[94]稍後《學燈》宣言將「建中國的未來文化」時，也清楚強調是「做我們積極的、基礎的、穩固的、建設的新文化運動」。[95]「我們」對應的恐怕仍

91 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卷1，頁29。
92 張東蓀，〈我輩對於新思想之態度〉，《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4月7日，第3張第3版。
93 張東蓀，〈答胡適之書〉，《時事新報》，1919年3月15日，第1張1版。
94 知非（藍公武），〈答胡適之先生〉，《國民公報》，1919年2月26日，第5版。
95 〈宣言〉，《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0年1月1日，第4張第1版。

是以《新青年》爲主的「他們」，而表述中「積極」、「基礎」、「穩固」、「建設」的潛臺詞，針對的則是新文化運動中流行的淺薄、偏激、破壞等趨向，而這些詞彙恰恰是此前他們批評《新青年》的常用語。[96]

蔣百里在 1920 年歐遊歸國，接手原本由張東蓀主編的《解放與改造》雜誌，有所整頓，並更名《改造》，整頓後第一期的主題便是「新文化運動」，他解釋說：「吾輩對於文化運動本身可批評，是一種自覺的反省，正是標明吾輩旗幟，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在蔣百里看來，之所以可以批評文化運動，是因爲「自覺的反省」，則批評成爲了自我批評，說明他們正是自我定位在新文化運動之中。不過，這一解釋，仍說明自身有顧慮，擔心被人誤會是批評他人，意識到「調節其橫流」的姿態可能引起反擊。蓋新文化運動中不只他們一家，故蔣又補充解釋，說「文字上用誘導語氣亦不致招人議論」。[97]在共學社的啓事中，梁啓超一派確實用了誘導語氣，自我定位爲：「對於文化運動，有兩種意味：一種是擴延到普通，一種是追求到精深」，總之「要使文化運動，不像那七八月間的陣頭雨，一陣一陣的，是要樣〔像〕那深山大谷裡的泉水一般，一滴一滴的，可是源源不絕，滾滾長流」。[98]語氣雖委婉，但試圖將陣頭雨的文化運動調節成泉水之用心，依然明顯。

梁啓超一派對新文化運動的調節是多方面的。即使在被章士釗目爲「獻媚小生」的白話文學方面，梁啓超一派亦非全是追隨。他們轉向思想界之初，張東蓀雖宣稱「我也是贊成白話的人」，並一度「頗想拿白話來譯高深的哲理書」，但很快「對於白話的觀念漸漸移轉了」，認爲「白話與文章同在一個階級上，沒有甚麼進步」，故「衹把文章改爲白話是不能滿足的」。他對「現在的改良文學家衹改用白話，便以爲盡了能事」很不以爲然，主張「吾們必定於白話、文章以外，另求一個進步的言語」。除不滿足只改用白話之外，他也反對「專

96 在此之前，《學燈》上便有文章批評北大同人，說：「最近大學中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好學，〈模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8 年 10 月 31 日，第 3 張第 1 版。

97 蔣百里，〈致任師書〉（1920 年 7 月 2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11-912。

98 〈共學社廣告．徵稿啓事〉，《時事新報》，1920 年 7 月 7 日，第 1 張第 1 版。

從文學（指小說劇曲）上著眼」。[99]其立言中提到「現在的改良文學家」，無疑指向《新青年》同人。傅斯年曾將此諷刺為爭「正宗」，[100]但除去爭勝之外，仍是贊同與修正兼具的意態。其實，早在 1917 年初，梁啓超便指出「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學之進步」，號召「乘此時機，造成一種國語」。[101]但他並未如胡適那樣主張「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102]並且，在白話詩方面，梁啓超有更多不同意見，他曾致信胡適，說：「超對於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103]胡適以此視梁「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

> 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中都討論過了，我很不願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表了。[104]

梁啓超此文或因聽從胡適勸告而未發表，但他之後〈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中等以上作文教學法〉兩文均替文言、韻文辯護。例如他在講授作文法時，一再強調「文言白話隨意」、「但看內容，只要能達，不拘文言白話」。[105]他們所主辦的《解放與改造》雜誌徵稿亦是「文言白話，聽作者自便，均以樸實潔淨為主」。[106]

錢基博曾觀察到，當時「少年有績溪胡適者，新自美洲畢所學而歸，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風靡一時」，在此情形下，梁啓超「大喜，樂引其說以自

99 （張）東蓀：〈白話論〉，《時事新報》，1919 年 1 月 17 日，第 1 張第 2 版。
100 傅斯年，〈答《時事新報》記者〉，《新潮》，卷 1 號 3，頁 528。
101 梁啓超，〈在教育部之演說（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育家之自覺）〉（1917 年 1 月），收入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卷中，頁 670。
102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卷 2 號 5（1917 年 1 月），頁 10。
103 梁啓超，〈與適之老兄書〉，《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22。
104 〈胡適致陳獨秀（稿）〉（1920 年底或 1921 年初），《胡適來往書信選》，卷上，頁 88。
105 梁啓超，〈中等以上作文教學法〉（1922），《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卷中，頁 899。
106 〈本刊啓事一〉，《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無頁碼。

張，加潤澤焉」，故新青年多說「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不過，錢基博同時指出，梁啓超「亦時有不『跟著諸少年跑』，而思調節其橫流者」，其表現爲：

> 諸少年排詆孔子，以「專打孔家店」為揭幟；而啟超則終以孔子大中至正，模楷人倫，不可毀也。諸少年斥古文學以為死文學；為駢文乎，則斥曰選學妖孽；倘散文乎，又謚以桐城謬種；無一而可。而啟超則治古文學，以為不可盡廢，死而有不盡死者也。[107]

這從側面說明梁啓超一派即使在追隨時，亦常常有調節以《新青年》一派爲主導的時代橫流的努力，白話文如是，在民主與科學之外強調哲學如是，其他如社會主義、整理國故諸方面亦復如此。在陳登原的觀察中，那時的梁啓超「喜與胡適輩浪相角逐」。[108]他們兩派之間的關係確實是追隨、角逐，又有調節。然而，在新文化運動中人看來，這樣一個強勢的後來者，即使不存心挑戰，也是一種針對。蔣百里未能顧慮到，他們此種誘導語氣的態度，仍招人議論。胡適的切身感受便是明證，當陳獨秀指責胡適與梁啓超一派接近時，胡適反駁：

> 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109]

在胡適眼中，無論是共學社、《改造》，還是講學、討論白話詩文、講學社延聘西方哲人，無一不是針對己方。

鄧中夏 (1894-1933) 看到新文化運動「一帆風順」、「稱霸一時」、「定於一奠〔尊〕」時，「惹人側目而視側耳而聽」、「憤憤的抱不平」，那時梁啓超等人「不能不出來拋頭露面的說話」、「明目張膽的作戰」，他稱之爲「反動派」。梁啓超一派所要調節的恐怕正是稱霸一時、定於一尊的橫流。不過，

[107]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 401-402。
[108] 陳登原，〈無據談往錄．梁啓超〉，《追憶梁啓超（增訂本）》，頁 275。
[109] 〈胡適致陳獨秀（稿）〉（1920 年底或 1921 年初），《胡適來往書信選》，卷上，頁 88。

與此前衛道者不同，他們「面子上卻滿塗著西洋的色彩」。[110]正如茅盾的觀察，梁啓超諸人最初雖以「反對新青年派的態度出現」，不過：

> 他們這反對的立場，不是封建勢力的立場，他們也是主張著新青年派所宣傳的「新文化」，然而他們一面還是反對新青年派。

他已看到梁啓超他們對新文化反對與贊成兼具，對此弔詭現象，認爲是由於他們「對於新青年派之戰鬥的態度感到過激，又一半也是有點醋意，因爲新青年派當時在青年界的影響太獨佔的了」。[111]甚至在舊禮教問題上，「研究系知識份子也同意於新青年派之反對舊禮教」，只不過不贊成謾罵的態度，「以新青年派之『鬥爭的氣氛』爲適足以僨事」。[112]茅盾與雙方都有密切關係，深悉內情，故能洞若觀火。

此種挑戰，與其說是反對，不如說是兩種（多種）新文化方案的競爭。事實上，新文化運動中的競爭非常普遍，張東蓀就曾說當時「幹文化運動的人沒有一個團結」，而「團結是競爭的反面」，他「對於現在文化運動最不能滿意的一點就是出版物很多，好像是互相競爭」。[113]張東蓀雖反對競爭，但有意思的是，在傅斯年看來，他們就是最主要的競爭者。傅斯年曾敏銳地指出，梁啓超一派是在「革新的事業，思想的更張」中與《新青年》「爭這個你後我先，爭那個你偏我正」，實際是爭以後歷史上的位置；又奉勸他們大可不必，因爲「中國思想界的新事業，現在只有小小的一個芽，若是爭歷史上的位置，至少須有十年的預備。努力預備罷！決賽的時候早著哩！」[114]傅斯年所說「爭那個你偏我正」，至少說明梁啓超諸人確實具有與《新青年》一方爭正偏之資格；而「至少須有十年的預備」，表明傅斯年覺得短期之內雙方可以共存，但最終

---

110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1923 年 11 月 24 日），《鄧中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卷上，頁 288。

111 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卷 19，頁 238。

112 茅盾，〈關於「創作」〉，《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二集》，卷 19，頁 269。

113 （張）東蓀，〈現在的文化運動是否應得修正？〉，《時事新報》，1919 年 11 月 26 日，第 1 張第 1 版。

114 傅斯年，〈答《時事新報》記者〉，《新潮》，卷 1 號 3，頁 529。

仍要決一勝負，在他看來，雙方的區別仍是根本性的，不可調和，並非僅是態度的區別。

梁啓超諸人絕非僅僅是為了競爭而立異以為高，實有所抱負。胡適在友善時稱他們是「立異以求同」，[115]形容或更準確。對於梁啓超諸人而言，所謂立異，實際是有著不一樣的文化追求，而求同則是試圖通過批評、對話，「使人『同』於我的『異』」，[116]讓自己的主張影響對方，甚至影響整體的時代潮流，再造一個自己理想中的新文明。

正因為他們前後期均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追求，方式、目標異於時流，故與其他方案時相衝突。比如他們前期側重社會，雖與國民黨人相近，但與胡適所主導的「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117]不同；即使是均側重社會，卻又因主張在預備期「少管小事」、「養精蓄銳」、「不要做零碎的犧牲」，[118]而被運動中的學生及主張「去作大破壞與大建設的工夫」[119]的國民黨人責難。[120]他們後期的文化方案雖調整為多談思想、學術，卻因東方文化的傾向與《新青年》對立，又因放棄了社會主義及具有革命性的社會改造方案，而常與國民黨人及後來的共產黨人為敵。所以，在旁觀者看來，張東蓀與李漢俊這樣的新文化人實在是「跑在一條路上」，有人質問兩人：「你們兩個人，跑在一條路上，為什麼大家要像煞不是『異趨同歸』？」並希望「我們既然在一條路上走，跑法盡可不同，用腳用車用飛機，多可不管。只要各自抱定目的，向上前去可以了。否則因為跑法的不同，自淘裡起了爭執，豈不是又多一重障

115 孫幾伊，〈胡適之先生談片〉，《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2 月 17 日，第 3 張第 3 版。胡適對張東蓀也說：「我嘗說你們『立異』的目的在於『求同』。」胡適致張東蓀信（1919 年 3 月 20 日），見〈張東蓀胡適之通信〉，《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3 月 24 日，第 3 張第 3 版。

116 〈胡適致錢玄同〉（約 1919 年 2 月底），《胡適來往書信選》，卷上，頁 11。

117 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 年 5 月 4 日），《胡適全集》，卷 22，頁 807。

118 （張）東蓀，〈零碎解決與總解決〉，《時事新報》，1919 年 9 月 22 日，第 1 張第 1 版。

119 先進（李漢俊），〈時局怎麼樣？〉，《星期評論》，號 16（1919 年 9 月 21 日），頁 2。

120 當時即有人意識到，「於施行總攻擊的前，先得有長期的預備。所以難免有人責難說，假使在預備總攻擊的時候，無聲無臭的過日子，未免不被人壓服到不能攻擊的地步」。慶邦，〈零碎攻擊與總攻擊〉，《時事新報》，1919 年 11 月 21 日，第 1 張第 1 版。

礙嗎？」並解釋說，「所謂自淘裡，就渾稱新文化運動」。這裡雖特指張東蓀與李漢俊，基本也適用於梁啓超諸人與其他新文化派別的關係，同是新文化運動，但又因跑法不同，常起爭執，「像煞不是『異趨同歸』」。李漢俊則回覆說：「現在所謂新文化，要素很複雜，主張資本主義的也有，主張軍國主義的也有，主張社會主義的也有，……宗旨完全相反的很多。把他們都拉到『自淘裡』去，未免不妥。」[121]其潛臺詞是，即使都在新文化運動的一條路上，也未必就是「自淘裡」，不妨起爭執。不過，他也不否認不同宗旨的主張都屬於所謂新文化。實際上，這正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眞實情狀，常常是「自淘裡起了爭執」。

梁啓超諸人因懷抱以自己的理想調節時代潮流，故在當時的思想界與其他勢力常處於時而追隨、時而競爭、時而合作、時而對立的交錯、動態的關係之中，深刻影響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走向。

四、形塑新文化運動的建設性力量

在五四學生輩曹聚仁的印象中，「研究系梁啓超派所創辦的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其在文化上所盡的大力，遠在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之上」，正因他們「站在新文化運動的激進線上」，使他們成爲「領導五四運動的文化人」。[122]此處的「五四運動」當指廣義的新文化運動。那麼，梁啓超諸人又是在何種意義上影響甚至領導了新文化運動呢？

從 1918 年底開始的數年中，「文化運動」一直是梁啓超諸人事業的重要一環。僅就在輿論界、出版界的勢力而言，梁啓超諸人擁有當時最有影響的幾大報紙，跟國內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關係最好，其勢力遠在北大一

121　樂勤：〈通訊（致張東蓀、李漢俊）〉，《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0 年 5 月 19 日，第 4 張第 2 版；李漢俊：〈自由批評與社會問題〉（1920 年 5 月 30 日），收入《李漢俊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頁 181。

122　曹聚仁，〈五四運動〉，《文壇五十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113。

方，甚至國民黨之上，無怪乎被認爲「包辦」了文化事業。事實上，這也是他們的雄心，例如，在教育界的布局中，他們有自己的大學（中國公學）且影響數所重要學府（清華、南開、東南）。梁啓超常視清華、南開爲其關中河內。[123] 所謂關中河內，自然是希望據此逐鹿中原。對此，舒新城說得更爲明白，他曾計畫由他與張東蓀等辦理中國公學，張君勱、徐志摩在南開講演，梁啓超、蔣百里在東南大學設自由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遍中國」。[124]

再以「共學社」爲例來說明梁啓超一派在文化界之能量。1920 年 3 月，梁啓超、蔣百里等一歸國，便與商務印書館商定合作。新文化運動初興時，商務印書館未能及時參與，被視爲「有些暮氣」、「十餘年來不見出幾部有價值的書」，在文化界的核心地位有所動搖。張元濟顯然感受到了威脅，亦在謀求改變。[125]可以說，這是一次新文化運動的局外人與新文化運動後來者的合作。梁啓超他們計畫「集同志編輯新書及中學教科書」，並「擬成一團體公司」，以圖「譯輯新書，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當時商務便決定「撥兩萬元預墊版稅，先行試辦一年」，後又增加一年。[126]正因爲有商務印書館的支持，共學社才能如此迅速成立。有意思的是，在與梁啓超達成合作之前，商務印書館本已有意與胡適合作，擬「以重薪聘胡適之，請其在京主持」，「專辦新事」，「每年約費三萬元，試辦一年」。而在與梁啓超一派接洽之後，則改爲梁啓超、胡適雙方各兩萬元一年，並特意說明「胡適之一面，亦如此數。屬任公不必約彼」。[127]

---

123 梁啓超，〈致百里東蓀新城三公書〉（1921），《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3。

124 舒新城，〈致任公先生書〉（1921 年 12 月 11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42。

125 〈沈澤民致白華函〉（1920 年 1 月 19 日），《宗白華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卷 1，頁 161；宗白華，〈評上海的兩大書局〉（1919 年 11 月 8 日），《宗白華全集》，卷 1，頁 89。面對新文化運動中各出版物的競爭，商務印書館曾計畫將《東方雜誌》減價，「一面抵制《青年》、《進步》及其他同等之雜誌，一面推廣印，藉以招徠廣告。」張元濟日記 1918 年 12 月 25 日條，《張元濟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卷 6，「日記」，頁 458。

126 張元濟日記 1920 年 3 月 13 日條，《張元濟全集》，卷 7，「日記」，頁 194。張元濟，〈與任公同年兄書〉（1920 年 4 月 10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頁 904。

127 張元濟日記 1920 年 3 月 8 日條、1920 年 3 月 13 日條，《張元濟全集》，卷 7，「日記」，頁 192、194。

張元濟之所以要特意叮囑不必約胡適，很可能是由於梁啓超曾透露要納胡適於麾下的意圖，蓋因其方才歸國，對當時國內思想界的格局與胡適如日中天的地位不很了解。同時，這一變動本身便頗具意味，象徵著原本新派中只胡適一方獨大，而梁啓超歸來後，變爲了雙峰並峙，所以胡適才會對「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感到介意。

「共學社叢書」持續十數年，出版各類著作八十多種，且絕大多數爲譯著，影響深遠。陶希聖清楚記得在 1920 年時要「買新書來讀」，便需去松公府的共學社，「比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又如拉馬克的《生物學》之類」。[128]

一個鬆散的群體，在短時間內舉辦如此多的事業，在當時絕無僅有。在展開文化事業之同時，此派又發起或介入了五四思想界中幾乎所有的思想論爭，包括新舊思想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社會主義論戰及人生觀論戰等。正是這些事業和論爭，讓他們深入參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

梁啓超諸人在五四時期的文化努力，一直爲人所關注。尙在 1919 年初，傅斯年便注意到：

> 幾個月事〔以〕來，為著暴亂政潮的反響，受了歐戰結局的教訓，中國的思想言論界，漸漸容受新空氣了。什麼民本主義，一齊大談特談。有幾家政黨作用的報紙，居然用白話做文，居然主張自由思想，居然登載安那其主義克魯泡特金的〈自敘傳〉。[129]

此處所說「有幾家政黨作用的報紙」，即是指梁啓超一方的《國民公報》、《晨報》與《時事新報》。[130]這是他們從事文化運動的起始階段，時人已經注意到轉變。讓傅斯年連用三個「居然」，也可見這一派轉變之明顯。到 1919 年下半年時，有人便看到「研究系近來亦頗研究世界思潮，其在京所出之《晨報》、

128 陶希聖，〈北大法律系的學生──從民九到十一〉，《潮流與點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 51-52。
129 孟眞（傅斯年），〈破壞〉（1918 年 12 月 17 日），《新潮》，卷 1 號 2（1919 年 2 月），頁 348。
130 《時事新報》自 1919 年 1 月 9 日開始連載〈無政府主義領袖俄人科洛撲禿金自敘傳〉，見《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1 月 9 日，第 3 張第 1 版。

《國民公報》甚好」，並將「陳獨秀敢言敢行與耽玩禪悅之研究系」對比，認爲「大異其趣」。[131]所謂大異其趣，除風格外，亦兼宗旨；不過，如此對比，便已是一種平起平坐，表明具競爭之資格。

從當年青年學生的直觀感受看來，這一派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身影也隨處可見。五四青年許欽文便記得，「《新青年》、《新潮》、北京《晨報副鐫》和後來上海出版的《學燈》、《覺悟》、《青光》，都爲好學的青年所注意」。這些報刊雖然「已經翻閱得破破碎碎了」，仍在青年中「郵寄來，郵寄去」。[132]許欽文印象中的六種刊物，《晨報副鐫》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便是梁啓超諸人的重要文化陣地。當年尚是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學生的夏衍則觀察到「《新青年》、《解放與改造》等雜誌，《覺悟》、《學燈》等報紙上的副刊，不僅在青年學生中起了巨大的啓蒙作用，而且還逐漸地把分散的進步力量組織起來。」[133]後來謝彬（1887-1948）更是這樣概括：「五四運動而後，研究系三字大爲一般人士所注目，蓋彼暫捨目前政權之直接爭奪，而努力文化運動，謀植將來競爭之穩固地盤者也。」[134]

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就舉措言，時人所說「爲新文化運動大賣其力氣」，「努力文化運動」，可謂有目共睹；就效果言，「大爲一般人士所注目」，絕非默默無聞。對其成績，謝彬更說：「（研究系）三年以來，多方進行，頗具成績，青年學子被羅致者亦不乏人，其潛勢力之繼長增高，未有艾也。」[135]可說成效顯著。其中，梁啓超的影響尤大，藍文徵後來回憶：「當五四新潮後，提倡科學的呼聲，響徹雲霄；同時整理國故，也被世人所重視。梁任公先生於民十及十一兩年，應北京、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各大學及教育團體的邀請，

131 吳虞日記 1919 年 7 月 11 日條，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吳虞日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 471。
132 許欽文，〈「五四」時期的學生生活〉（1959），《學習魯迅先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頁 7-8。
133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26。
134 謝彬，《民國政黨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78。
135 謝彬，《民國政黨史》，頁 178。

連續講演中國文化學術，不下二百次，學子景從，風氣大開。」[136]梁啓超赴各地演講，本爲他們所計劃之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學子景從」表明有人氣，「風氣大開」表示有影響。在那個爭奪青年的五四時期，謝彬與藍文徵都注意到梁啓超他們對青年或學子的吸引力，從側面說明這是一個面向青年的運動，而梁啓超一派延攬青年的努力也有所回報。

由以上數段觀之，梁啓超諸人似乎確有以新文化運動主人、正軍自命的底氣。正如李錫五在 1923 年時說的，梁啓超從歐洲回來後的作爲，「大可自豪於新文化運動領袖之林」；惲代英在轉述時人的話時，也說「研究系」曾在新文化上面出過鋒頭。[137]

進而言之，梁啓超諸人並非僅僅增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即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不僅是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質的改變。他們希望藉自身之影響力「左右中國文化」，故他們才會有意識地調節新派。實際上，他們也確實影響了《新青年》同人。傅斯年主編《新潮》時，便曾聽取了張東蓀對《新潮》的批評，於是才改變編輯方針，主張「批評少下去，介紹多起來」。[138]同樣，也正因爲有《時事新報》同人與《新青年》派關於「外國偶像」與「固有文化」的爭論，才使得傅斯年、胡適調整表述，促使他們使用更折中、開放的口號——「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整理國故」來回應對方質疑。[139]茅盾後來回憶說，「在五四期以後新時代的展開的當面，新青年派落伍了」，而「在新青年派落伍了的時候」，他們與「研究系」（梁啓超諸人）「才更沆瀣一氣」，因爲「新青年派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命令而取消了自己早年的鬥爭精神」。需要注意的

---

136 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收入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78。

137 李錫五，〈致梁啓超之一封書〉，《民國日報》（廣州），1923 年 8 月 3 日，第 7 版；惲代英，〈告因學潮退學的人們〉，《中國青年》，期 38（1924 年 7 月 5 日），頁 11。

138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運動回憶錄（續）》，頁 217。

139 周月峰，〈折中的「重估」：從「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近代史研究》（即刊）。

是，他同時又說，「研究系」是「百分之百地代表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140]這似乎暗示了新青年派正是接受了梁啓超諸人的命令，才「取消了自己早年的鬥爭精神」。以「命令」來解讀，無疑將雙方的複雜關係簡單化了，但至少從上述《新青年》與《新潮》的例子來說，他們雖不是直接接受命令，但顯然是受到調節。

梁啓超一派加入新文化運動，除對《新青年》的影響外，他們所提出的觀念、話題，常常直接影響思想界，甚至改變新文化運動的風向。最明顯的便是將思想界關注的焦點從思想文藝轉向社會、政治、經濟，尤其是在傳播社會主義方面發揮極大作用。

社會主義被認爲是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潮流。《晨報》從 1919 年 2 月 7 日起，增加介紹「新修養、新智識、新思想」的《自由論壇》和《譯叢》兩欄，開首第一篇即爲李大釗的〈戰後之世界潮流〉，介紹俄國的社會革命。[141]《時事新報》上更曾發起題爲社會主義的徵文，贊成說、反對說與譯述均可。[142]在他們的機關刊物《解放與改造》中，宣揚「第三種文明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且認爲當時的文化運動應「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工夫」。[143]事實上，《解放與改造》幾乎每一期均以廣義的社會主義爲主題：工團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林林總總，無所不包。故羅家倫曾認爲《解放與改造》有兩個特長，即注重社會主義和注重介紹一切新學說。並說「社會主義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解放的精神：所以在《解放與改造》裡談社會主義，是狠〔很〕合宜的事」。[144]梁啓超一派後來更組織翻譯「馬克思研究叢書」，擬定的書目包括：《資本論解說》（柯祖基著）、《文化史上底馬克思》（柯祖基著）、《唯物史觀解說》（郭泰著）、《馬克思派的社會

140 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1931），《茅盾全集．中國文論二集》，卷 19，頁 238。

141 〈本報特別啓事〉，《晨報》，1919 年 2 月 7 日，第 2 版；李大釗，〈戰後之世界潮流〉，《晨報》，1919 年 2 月 7 日，第 7 版。

142 〈本欄徵文〉，《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 年 4 月 28 日，第 3 張第 3 版。

143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卷 1 號 1、2，頁 2、5。

144 志希（羅家倫），〈解放與改造〉，《新潮》，卷 2 號 2（1919 年 12 月），頁 360-361。

主義》（納肯著）、《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燕格士著）、《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河上肇著）、《馬克思傳附燕格士傳》（堺利彥、山川均著）、《馬克思呢？康得呢？》（格華尼芝著）、《修正派社會主義》（柏倫修泰因著）。[145]

與梁啓超諸人政治立場不同的鄧中夏觀察到《時事新報》對社會主義的鼓吹：「當新文化風動全國時，該報記者張東蓀亦曾爲新文化運動大賣其力氣，並鼓吹社會主義，當時青年頗爲嚮往。」[146]國民黨人也認爲，他們在鼓吹社會主義方面功不可沒，馮自由說：

> 舊進步黨人經過歷年政治的教訓，近來似有一番大大的覺悟，他們所辦的上海《時事新報》、北京《晨報》、北京《國民公報》，都極力發揮社會主義，中國人年來鼓吹這種主義報紙，以他們所辦的為最多，著論及譯述等文件也很不少，這真是社會主義的功臣。

他甚至承認這「是我們最早提倡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人所不及的」。[147]

更重要的，梁啓超一派加入思想界後，甚至使得思想界成爲了一個「新輿論界」。五四運動的發生，使得整個新文化運動的基調開始激進，傾向革命，梁啓超一派不只身處其中，更推動了這一轉向。五四學生運動是一場瞬息變化的政治運動，在每天都需要傳遞訊息的運動中，日報的地位驟升，甚至連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人也常常需要借助《時事新報》、《晨報》和《國民公報》發聲。故張東蓀、藍公武等當時在多份報紙及《解放與改造》上介紹社會主義、討論社會問題，一時蔚爲風氣。此種變化受當時學生運動及輿論影響，又反過來影響學生運動與輿論。

胡適雖被認爲是新思潮之領袖人物，但五四之後文化運動的發展顯然已超出他的預想。當時的輿論界使胡適「大失望」：

---

145 〈《馬克思研究叢書》廣告〉，《時事新報》，1920 年 6 月 12 日，第 1 張第 2 版。

146 鄧中夏，〈上海的報紙〉（1924 年 2 月 23 日），《鄧中夏全集》，卷上，頁 403。

147 馮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之過去及將來〉，《民國日報．覺悟副刊》，1920 年 1 月 16 日，第 13 版。

> 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

胡適直言：「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古典主義。」他認爲當時的輿論界成了「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148]

不僅是「主義」，其實話題的側重點也在轉變。胡適在 1919 年底曾標舉十類「新思潮」——孔教、文學改革、國語統一、女子解放、貞操、禮教、教育改良、婚姻、父子、戲劇改良，幾乎全是五四學生運動之前的話題。其實，他當時也注意到「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149]一年後，他更承認五四後更爲流行的恰是「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名詞，[150]在話題上與五四前的十類「新思潮」迥異，從「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眞可以說思想界在五四之後「變了質」。並且，他認爲，這完全是由國民黨、共產黨、「研究系」造成。[151]胡適說這話時已是 1960 年，故多注意國共兩黨，實際上，上引材料中，反復出現的取消社論、時評的「他們」，或者一再點到的「解放」、「改造」均是指張東蓀、藍公武等人。

在周作人看來，以五四事件爲界，前頭的一段是「文學革命」，後頭的一段才是眞正的「新文化運動」。[152]無論從「文學革命」到「新文化運動」變質

---

148 胡適，〈我的歧路〉（1922 年 6 月 16 日），《胡適全集》，卷 2，頁 468-469、471。

149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 年 11 月 1 日），《胡適全集》，卷 1，頁 693、699。

150 胡適，〈提高與普及〉（1920 年 9 月 17 日演講），《胡適全集》，卷 20，頁 67；〈北京大學開學演說詞〉（1920 年 9 月 16 日），收入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 202。

151 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 年 5 月 4 日），《胡適全集》，卷 22，頁 807-808。

152 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卷 9，頁 762。

的過程中，或者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中，梁啓超諸人實有重大影響，甚至不亞於胡適。在魯迅看來，連「新文化運動」一詞，本身就是梁啓超一派所「另起」，他說，五四運動後，革新運動表面上有些成就，於是主張革新的人也漸多，這裡面「有許多還就是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他又說：「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爲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153]

需要指出的是，在 1920 年之後，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有一明顯轉向，然即使轉向穩健之後，其勢力及影響仍不容小覷。毛澤東在 1921 年初觀察到，當時國內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便是陳獨秀諸人；另「一派則主張改良」，即爲「梁啓超、張東蓀諸人」。[154] 此時梁啓超歸國已近一年，在毛澤東看來，梁啓超、張東蓀諸人仍是可以和陳獨秀諸人分庭抗禮的一方。胡適後來便回憶說，到 1919-1920 年間梁任公先生發表他的《歐遊心影錄》，科學方才在中國文字裡正式受了「破產」的宣告。[155] 伍啓元則說在那一時期的國故整理上有最大貢獻的，「仍要推梁啓超」。[156]無論是對科學的反思，對整理國故的提倡，抑或人生觀論戰和東西文化的討論，梁啓超諸人均是其中的要角，都直接影響新文化運動之走向。

有意思的是，胡適本是新文化運動中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之一，在 1920 年時卻感覺到「時時刻刻」在梁啓超一派「包圍之中」，胡適列舉該派的事業

153 魯迅，〈熱風．題記〉（1925 年 11 月）、〈寫在《墳》後面〉（1926 年 11 月），《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 1，頁 308、301。此段論述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頁 99。

154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1921 年夏），收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17。

155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胡序〉（1923），收入亞東圖書館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32），頁 3。

156 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上海：現代書局，1934），頁 57。

包括「辦共學社」、「改造《改造》」、梁啓超「講學」、「延聘羅素、倭鏗等人」。[157]稍後孫伏園則看到「現在的文化事業，被任公包辦去了」，並替胡適「可惜」，希望胡適仍舊致力文化事業。[158]在新文化運動中，梁啓超一派雖是後來者，卻逐漸居上，能對《新青年》一方形成「包圍」，最能說明梁啓超他們的「新文化運動」規模有多龐大；且無論「包圍」或「包辦」，多少佔領、取代了胡適一方原有的地位，這也是爲何孫伏園要替胡適「和任公吃醋」。[159]甚或可以說，在一定時期，梁啓超諸人的「另一場新文化運動」正是新文化運動的「正軍」。如果說之前是張東蓀、藍公武要調節《新青年》同人所引領偏向思想、文藝，反傳統的橫流，而此時梁啓超一派之主張已漸漸得勢，「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興論界」甚至把胡適「激出來」發表〈問題與主義〉試圖調節，不過已自認「提倡有心，創造無力」。[160]

正如時人所觀察到的，在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雜誌最初把握著思想界的權威」，但後來：

> 研究系的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等也組織了共學社，出版了《解放與改造》雜誌；國民黨的胡漢民、戴季陶、沈定一等也抱著改組黨務的意見，出版了《建設》及《星期評論》雜誌；與自由派的《新青年》，成為鼎足的形勢。

五四前是「全部文化改造」，五四後「偏重政治與經濟」。在這過程中《新青年》、《每週評論》「只能徘徊於前期，而不能順應中國特殊的環境，以躍入於後期」，故「漸漸黯淡，漸漸失了青年們的崇奉」，甚至「不能與研究系及國民黨爭衡」。[161]此或是作者有《春秋》責賢者之意，對研究系與國民黨的地位過於抬高，但不可否認，五四學生運動以後，梁啓超等人與國民黨在新文化

157 〈胡適致陳獨秀（稿）〉（1920 年底或 1921 年初），《胡適來往書信選》，卷上，頁 87-88。
158 季融五致胡適信，見胡適日記 1922 年 8 月 13 日，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 3，頁 757。
159 季融五致胡適信，見胡適日記 1922 年 8 月 13 日，《胡適日記全編》，卷 3，頁 757。
160 胡適，〈我的歧路〉（1922 年 6 月 16 日），《胡適全集》，卷 2，頁 471。
161 天行（周予同），〈第四期之前夜〉，《一般》，卷 6 號 1，頁 9。

運動中的影響力確已有極大提升，足以與《新青年》分庭抗禮，在競爭與合作中，共同形塑著新文化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諸人參與並影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並無疑義。然而，到 1923 年中國共產黨提出思想上的聯合戰線，嘗試以階級分析法重新劃分思想界時，梁啓超諸人的地位開始變得模糊。瞿秋白將新文化運動分成「士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革命主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派）三派，其中，張東蓀、梁任公等人即代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162]瞿秋白雖認爲新文化運動的最終勝利必定在無產階級一方，但在其劃分中，梁啓超諸人仍具有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地位。陳獨秀則認爲「蔡元培、梁啓超、張君邁〔勱〕、章秋桐、梁漱溟」等雖「號稱新派的」，其實「仍舊一隻腳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隻腳或半隻腳踏在近代思想上面」，並提出：「適之所信的實驗主義和我們所信的唯物史觀，自然大有不同之點，而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163]在此敘述中，梁啓超諸人僅是半新半舊，即使不被掃蕩，大概也不能代表新文化。而鄧中夏則明確將梁啓超、張君勱、張東蓀等歸爲「東方文化派」，認爲是「假新的，非科學的」，是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是「眞新的，科學的」，需要「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164]在歷史敘述中，梁啓超一方的形象終從「新文化運動領袖」變爲了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因梁啓超諸人在激進的時代常常持漸進的態度，故逐漸淡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記憶（或僅以反對者的形象留存）。[165]

---

162 瞿秋白，〈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1923 年 9 月 23 日），《瞿秋白文集 · 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卷 2，頁 215。

163 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1923 年 7 月 1 日），《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卷 3，頁 102。

164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1923 年 11 月 24 日），《鄧中夏全集》，卷上，頁 288-291。

165 梁啓超諸人淡出新文化運動歷史記憶的初步探討，參見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28-47。

五、結論：多元互動中形成的新文化運動

羅志田指出，一個同質性的五四形象「並非僅僅是在無意中『形成』」，也包括當時人及後人的有意「構建」，「在定型中模糊了原型，失去了鮮活」。[166] 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盤根錯節、此呼彼應，化約後的敘述，不一定錯誤，但時或不夠準確，遮蔽了史事紛繁的一面。

五四時期謀求改造的新文化群體、方案眾多，因各自不同的「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從而形成不同的新文化方案，這些方案獨特，卻不孤立，在同一舞臺上面臨相同的問題，一貫而不可分；但同時又山頭林立，錯綜複雜，各群體「各自站在不明瞭的地位上，一會兒相攻擊，一會兒相調和」，[167]在這一過程中，也在不同程度地形塑對方且同時被對方形塑。所以，即使僅僅是爲了更好理解我們所關注的《新青年》同人的「新文化運動」，也應該同時將注意力擴展到他們思想與社會上的四鄰——無論追隨者、反對者、競爭者或合作者；如果沒有了競爭者與聽眾，它很可能也將變成另一種樣態。

進而言之，正是這眾多的群體與改造方案匯聚在一起，才形成了廣義的新文化運動。蔣夢麟在「五四」時期認爲「凡天下有大力的運動，都是一種潮」，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是「愈演愈大，愈激愈烈，就釀成新文化的大潮」，「奔騰長流」、「澎湃騰涌」。[168]正如梁啓超所說，在民族混化社會劇變的時代，「思想界當然像萬流競涌，怒湍奔馳」。[169]當時的參與者好似匯入這一潮流的百川之水。他們是否有統一藍圖，是否完成，都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這些參與者的存在本身對於作爲整體的新文化運動有構成作用，眾多群體「交互影響，

166 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爲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26-27。
167 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卷 1，頁 29-30。
168 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 年 9 月），《蔣夢麟教育論著選》，頁 128-129。
169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1922），《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頁 67。

承遞嬋綿，而共以構成一活動的全體者也」。[170]其實，新文化運動正是這許多想的不一樣的人和群體，「走到一起而共同創造歷史，形成一個『會合的歷史運動』」。[171]它不是一個預先的設計，而是不斷變動中的各方力量在互相競爭中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

梁啓超諸人的「新文化運動」便是這百川之水中極重要的一支。他們不是既存言說中新文化運動的外在對立物，也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獨立勢力，而是在「縱貫橫通之聯絡」中，表現個性、共性，成爲構成新文化運動活動的全體的建設性力量。[172]梁啓超一派與革命黨人在清末的舊怨，「研究系」在民初政治中與國民黨人的激烈競爭，胡適對梁啓超的崇拜與競爭，都是塑造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性力量。過於簡單的「整體論」描述，或許不僅僅抹去其文化觀點與作爲，也湮沒了他們在參與、論爭、遊走與互動中推動、形塑新文化運動的過程。

更重要的，眾多群體、方案共存的思想界，並非僅是亂哄哄、思想紊亂搖蕩的狀態，在持續、眾多的追隨、攻擊、調節中，促使思想界不斷演變，不一定是按照某一方的既定方向，而是在共力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前進。只有盡可能充分梳理五四時期更多的群體與方案及相互競合的具體過程，才能呈現新文化運動紛紜錯綜、複雜萬狀的生態，也才能更好理解五四思想界的形成與走向。

170 繆鳳林，〈研究歷史之方法〉，《史地學報》，卷 1 期 2（1922 年 4 月），頁 2。

171 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爲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5。

172 柳詒徵注意到，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中心人物」，不過「各方面與之聯繫，又各有其特色，或與之對抗，或爲之贊助」，並且「妙在每一事俱有縱貫橫通之聯絡，每一人又各有個性共性之表見」。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06-107。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湖北省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李漢俊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吳虞日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
杜威著，趙協眞譯，《杜威全集．中期著作》，卷 13，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亞東圖書館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32。
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林同濟著，江沛、劉忠良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雷海宗．林同濟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茅盾，《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梁啓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許欽文，《學習魯迅先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陳獨秀著，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舒新城，《我和教育》，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
蒙文通著，蒙默編，《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書社，2015。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蔣夢麟著，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鄧中夏，《鄧中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二、報刊

《一般》（上海），卷 6，1928。
《大公報》（長沙），1917。
《中國青年》（上海），期 38，1924。
《民國日報》（上海），1919、1920。
《民國日報》（廣州），1923。
《申報》（上海），1917、1920、1924。
《改造》（北京），卷 3，1920。
《京報》（北京），1921。
《孤軍》（上海），卷 2，1924。
《星期評論》（上海），號 16，1919。
《時事新報》（上海），1917、1918、1919、1920。
《時事新報》（重慶），1938。
《國民公報》（北京），1918、1919。
《晨報》（北京），1919。
《新青年》（北京），卷 2、卷 5，1917、1918
《新潮》（北京），卷 1、卷 2，1919。
《解放與改造》（上海），卷 1，1919。
《認識月刊》（上海），卷 1，1937

三、專著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上海圖書館編印，《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上海：上海圖書館，1979。
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上海：現代書局，1934。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啓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常乃悳，《中國文化小史》，上海：中華書局，1928。
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爲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
謝彬，《民國政黨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

四、論文及專文

元青，〈梁啓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頁 44-51。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啓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入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 1-32。
李達嘉，〈五四運動的發動：研究系和北京名流的角色〉，收入李達嘉編，《近代史釋論：多元思考與探索》，臺北：東華書局，2017，頁 119-180。
周月峰，〈從批評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學燈》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研究》，2015 年第 6 期，頁 197-204。
周月峰，〈「革命」的文化運動：「五四」後張東蓀的新文化方案〉，《天津社會科學》，2019 年第 3 期，頁 139-149。
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頁 28-47。
周月峰，〈五四運動與張東蓀「總解決」方案的形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58 期 1，2019 年 1 月，頁 118-127。
周月峰，〈折中的「重估」：從「重新估定一切價値」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近代史研究》（即刊）。
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2018 年第 5 期，頁 61-81。
崔志海，〈梁啓超與五四運動〉，《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190-206。
張朋園，〈梁啓超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卷 6 期 1，1973 年 3 月，頁 1-15。
彭明，〈「五四」前後的研究系〉，《歷史教學》，1964 年第 1 期，頁 25-32。

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鬥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 年第 4 期，頁 28-41。
楊絳，〈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收入錢鍾書，《七綴集》，頁 1-2。
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收入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618-644。
董德福，〈梁啓超與五四運動關係探源〉，《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8 期 6，2006 年 11 月，頁 29-36。
鄭師渠，〈梁啓超與新文化運動〉，《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頁 1-37。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1-32。
繆鳳林，〈研究歷史之方法〉，《史地學報》，卷 1 期 2，1922 年 4 月，頁 1-21。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 259-263。
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頁 92-101。
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爲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4-27。

Another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f Liang Qichao's Circle and the Intellectuals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ou Yuefeng*

Abstract

The diversity, conflicts, and kaleidoscopic natur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as mostly been ignored by historians. However, the real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gradually formed by these various groups with their own agendas through collaborations, revisions, and competitions. Among these diverse projects,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f Liang Qichao's circle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since they had a major influence on history. They initiated their own New Culture Movement, hoping to "rebuild a new society, different from both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rough emancipation," by which they could reinvent this civilization. Their goals and means wer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Youth* circle was as neither followers nor antagonists. This circle was neither the opposit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nor a voice isolated from the dominant discourse. Rather, its members were active participants of this time, and reshaped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exerted their own influ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at we have forgotten is not only their cultural standpoints and pursuits, but also their role in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is history.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Culture Movement, Liang Qichao, research clique, Zhang Dongsun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